

弯弓射日大江边

江浦县委党史办公室

站在抗日最前线的共产党、新四军，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领导江浦人民抗击了日本侵略者。

(一)

一九三九年一月，新四军江北第一纵队第二大队进入江浦境内，进行抗日活动。接着江北纵队第一大队、四支队八团、五支队十团和三支队一个连也来江浦地区抗日。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抗日革命武装不时来江浦境内活动。

这些抗日革命武装来到江浦之后，一方面宣传抗日，打击日伪军；另一方面帮助地方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游击武装，建立情报、联络组织，进行统战工作。

江北纵队第二大队第四连三九年一月进入江浦，至六月回无为总部，在江浦的桥林、七坝、周家营、乌江等地活动了半年时间。他们在这里宣传抗日，打击日军，为群众挑水扫地，秋毫无犯，使江浦人民亲眼看到新四军真是人民的军队，抗日的武装。

这个大队的政治处民运工作人员宋超等，在和县的香泉发展进步青年教师张智锦入党，在江浦石村庙发展青年农民乔正才等入党；为和县和江浦撒下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批红色的种子。一九三九年五月，这个大队的政治处主任祁式潜同志奉命组建和江中心县委，由祁式潜任书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江浦县第一个县级党的领导机构。与此同时，还成立了“江浦办事处”、“江浦抗日联合会”，其负责人都由祁式潜同志兼任。

不久，二大队调回无为为总部，祁式潜等领导同志随之离去，“和江中心县委”等党政领导机构也随之撤消。

一九三九年七月，新四军五支队十团从定远开来江浦，至同年九月离去，开赴津浦路东，前后在江浦活动了两个多月时间，打了五次大小战斗。八月中旬的一天，十团参谋长宋文同志带领该团二营的六连和七连，冒着烈日酷暑，埋伏于七里桥，待机打击日军车队。他们用手榴弹炸毁日军汽车两辆，打死打伤日军五、六十人。这是五支队组建后对日作战的首次胜利。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同志曾通令嘉奖。

(二)

一九四〇年四月，根据中原局指示，皖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江和全工委，重新开辟和江地区，打开和江地区抗日新局面，派胡克诚同志任工委书记。

四月初，胡克诚随部队来到和江边境地区，和乔正才、张智锦以及由张智锦发展的地下党员浦玉民等取得联系，宣布成立江和全工委和香泉、赤镇两个区委（全为地下）。

六月，国民党二支队千余人进一步攻入和江地区，袭击我党政机关游击武装和根据地。江和全工委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工委书记胡克诚至江浦民报工作，派人去路东寻找组织。后由路东省委介绍至路西省委，路西省委将江和全工委划归路西地委领导，工委机关设于

全椒周家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工委机关又迁至滁县花山枣林集一带，直至一九四三年三月工委撤销为止。

中共江和全工委（一九四二年五月改为中共江和全县委）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其复杂的政治条件下，开展抗日斗争，把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

中共江和全工委发展了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几个党员发展到十多个支部，近百名党员。

中共江和全工委培养了土生土长的抗日骨干分子，如张智锦、浦玉民、孔平、王苏民、乔正才等同志。他们后来都成了江和全地区的抗日领导骨干。有的同志为抗日英勇献身，有的同志至今仍然是党的骨干。

江和全工委壮大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建立了“江和全游击队”、“和北游击队”、“八大禁游击队”和“周宗汉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工委领导下，通过做好刀会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对日斗争。一九四二年春，江和全游击队袭击了“石桥三光洋行”，将洋行的货物分给了当地群众。一九四二年十月，周宗汉游击队在乌江西南的黄墩村与日伪军激战了五个多小时，日伪军被毙伤数十人。但终因敌众我寡，游击队绝大部分牺牲和被俘。队长周宗汉亦当场英勇牺牲。工委组织部长张智锦被俘。张被俘后被敌人关押狱中，折磨多日，杀害于香泉晓山脚下。张在狱中坚持斗争，就义时面无惧色，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江和全工委通过派人秘密勘察路线、建立联络站、扫除障碍、武装护送、秘密通行等办法，建立起“二、七师交通线”，使二、七师的物资、文件、人员从这条交通线上安全通行。

（三）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地处滁河两岸的江和全地区，因之一分为二。滁河以南划给了皖江地区，成立了江全县；滁河以北地区与滁县合并一起，成立了滁全县。

一九四三年三月，江全县委、江全办事处、江全大队宣布成立，胡克诚同志留在河北，任滁全县委书记，由时生同志任江全县委书记，李岩同志任江全办事处主任（后由顾训芳担任），顾鸿同志任江全大队大队长（后由陈高俊、吴瑞生等同志担任）。

江全县委、江全办事处、江全大队是在全国解放区不断扩大、抗日战争形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些县级抗日革命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江全地区的抗战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和任务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以开辟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确保二、七师交通线为主要目标。为了在敌堡林立，顽军遍地的江全地区完成这样的任务，和含支队给江全大队调配了久经考验、英勇善战的指导员，装备了较好的武器，同时还配备了电台。和含支队的独立大队也常进驻江全地区，与江全大队并肩作战。

江全大队刚刚组建，就投入了紧张的抗日战斗中。

一九四三年夏，江全大队带领张集一带刀会，攻打绰庙集日伪据点，旗开得胜。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乌江日军一小队和伪军六十多人，到我根据地石村庙骚扰，被江全大队两个中队和独立大队一个中队包围，激战四个多小时，一小队日军几乎被全部歼灭（只跑了一人），五十多伪军被我俘获。一九四四年五月，江全大队侦察班及三中队在其他中队配合

下，巧计围打陈家浅伪军据点，一举攻克，俘获伪军中队长段义文及其所部六十多人。一九四五年六月，江全大队攻打大黄洲伪据点，指战员乘船上岸，很快攻入。但因敌钻入碉堡暗层，战斗受阻，未获全胜而撤回。虽然如此，已吓破了敌胆。敌不日即主动撤离据点，大黄洲获得解放。时生、王训友、王苏民等领导同志进入大黄洲。

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组建，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江全大队共对日作战三十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十多次，共拔除日伪据点十多处，解放被日伪占领和控制地区达四百平方公里以上。

江全县委一方面抓武装斗争，一方面抓发展党组织工作。针对江全地区非常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采取部队和地方共同负责，即部队中的党组织也负有在地方发展党员的任务。部队在地方发展了党员之后，及时把党的关系转给地方。经过不断努力，在二年半的时间里，江全地区就先后成立了六个区委、三十多个支部，共有党员约二百多人。这些党组织大部分在根据地和游击区，也有一些在敌占区，在敌人的老巢旁。

以党员为骨干，又建立了许多联络站，吸收大量非党抗日积极分子参加交通联络工作。这种联络站，根据地里有，游击区里有，敌占区里也有。如在敌占区域的公子洲、火龙山都建立了联络站。这些联络站负责搜集和传递抗日情报、购买抗日军火及其他军用物资。

以武装斗争开道，以党的建设为基础，又做好刀会及国民党的统战工作，逐步建立起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好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春夏之间，成立香南区政府和香北区政府。香南区包括和县县城、乌江、香泉、西埠和卜集在内的大片地区；香北区包括张集以北的绰庙集、金城庙以南、夹山关以东、曼家庙、石桥以西地区。

一九四四年春，又建立了北山区和桥林区。北山区包括绰庙、星甸一带地方；桥林区包括桥林以西，陡岗以南、石桥以东、乌江以北这块地方。

一九四四年秋，北山、桥林、香北等区被国民党占领，又建立了星湖区（乌江南面的七星湖一带）。

一九四五年夏，又在大黄洲等地建立了两个区级政权，在浦口柳洲建立了秘密的花浦区。香南、香北、桥林、北山、星湖等区一般每区都建立了五至十个乡政权。

这些区乡政权的工作人员一方面掌握武器，开展武装斗争；另一方面进行收税征粮、扩军、治安、宣传等抗日行政工作。

（四）

中共江全工委在江浦西部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同时，由路东省委（后淮南区党委）、路东地委领导的抗日斗争活动，在江浦的路东地区也热烈进行着。

一九四二年秋，组建来江独立团（后编入来六支队）。

一九四二年十月，成立了江浦办事处。江浦办事处专做江浦路东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及伪军工作。办事处主任叶品三。

一九四三年三月，铁路工委第三区铁路便衣大队第三中队在津浦路乌衣至浦口段成立，在铁路两侧各二十公里范围内开展抗日活动，做铁路上的伪军工作（后铁路工委、铁路便衣大队撤销）。

一九四三年冬，来安县又成立了江浦相官区，在花旗至东葛一带的铁路沿线开展工作，有时破坏日军铁路交通，有时又负责掩护我方人员通过铁路。

一九四四年十月，划来安、六合部分地区、合江浦东部地区正式成立新的“江浦县”，包括永宁以东、浦镇以北、葛塘以西、新集以南一片地区，成立了中共江浦县工委。工委书记刘力行。

一九四五年一月，撤销江浦办事处、中共江浦县工委，成立中共江浦县委、江浦县政府。县委书记刘力行，县长叶品三，副县长纪立纲。县委、县政府的主要办公地点在文山集杜庄。

江浦县下辖新集、汴河、盘城三个区。

这个江浦县，是淮南抗日根据地面对南京的前哨。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伪军工作以及城市工作；到浦镇、浦口、南京城内去交朋友，建立“关系”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敌人的要害部门建立“关系”，发展党的组织，为全面反攻，解放南京做准备工作。县委书记刘力行、县长叶品三、副县长纪立纲、组织部长石明之等县区领导同志都各自深入浦镇、浦口、南京做秘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之后，伪江浦县政府的翻译、浦口火车站伪军小队长等都成了我们的“关系”。他们掩护我人员过境，向我提供情报。浦口水塔一水泵工人入了党，南京大学和一些中学里也有了党员。经过多次联系说服教育之后，伪江浦自卫团团长朱福五率部起义投诚了。由罗炳辉司令员任命朱为我江浦独立团团长。

江浦县委、县政府虽不以武装斗争为主要任务和主要革命手段，但亦有少量武装并注重根据地建设，有县区队和乡小队，有民兵组织，有时也进行武装斗争，打击到根据地抢粮的日伪军，进行破坏铁路的活动。北城乡乡长李树之同志，在阻击抢粮的日军战斗中牺牲。

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到日本投降的一年时间里，江浦县已建立起三个区级政权，近二十个乡级政权，建立了十四个支部，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建立起近四百平方公里、约十四万人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

中共江浦县委、江浦县政府较好地完成了淮南区党委、路东地委交给的抗日任务，为进军南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由于国民党抢着“下山摘桃子”，迫不及待地抢占南京，我们放弃了解放南京、接受南京日军投降的计划。

江浦县委在抗战后期的政治军事活动

原江浦县委组织部长

石明之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现改名为伏尔加格勒）的保卫战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以后，苏军即转向对入侵的德军大举反攻，乘胜西进，德军节节败退。一九四四年，意大利的米兰和都灵、法国的巴黎相继获得解放。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最先垮台，德国也摇摇欲坠，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中国战场，由于解放区军民英勇抗战，解放区更加巩固与扩大，对日军所占的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已形成了包围之势。日军困难重重，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

我党吸取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经验，作好反攻的准备，以便在反攻时机到来时，夺取大城市和铁路交通大动脉。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淮南区党委加强了敌占区的工作。一九四三年秋成立了浦六工委，开展六合、两浦沿江一带的抗日斗争。

一九四四年十月，成立了江浦工委和江浦办事处，开展津浦铁路南端和南京市内的抗日斗争。工委书记刘力行，办事处主任叶品三。一九四五年一月，路东地委又将工委改为县委，办事处改为县政府。县委书记仍为刘力行，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石明之，县长叶品三，副县长纪立纲。

县委和县政府分别属路东地委和淮南行政公署领导，武装力量属路东军分区领导。升了级，改为县以后，力量有所加强，对外更有号召力，便于开展工作。但这个县委、县政府与一般县委、县政府有所不同，并不

着重一般的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而主要进行敌伪军工作及城市工作。

江浦县委和县政府比较固定的驻地在来安县文山集的观音寺。该寺坐北向南，内有大殿数间，东西两侧各有厢房三间。县政府住西厢房，县委住东厢房。寺前有一棵大银杏树，枝繁叶茂。夏天，银杏树下成为县委的接待室和会议室。那里离浦镇和铁路线很近，为了防备敌人的袭击，晚间要转移到农村去。大家对这种游击生活，习以为常。

当时江浦县下面划分三个区：新集区，区长刘开泰；汴河区，区长谢良，副区长黄经权，区委书记周元首，区队长陈国华；盘城区，区长黄超，区委书记蒋益农（先）丁健吾（后）邱泽源（再后）。这三个区在我们势力控制以内，都是原来安、六合、江浦三县的边缘地区，而日伪和国民党对这些边缘地区是鞭长莫及的。

在控制区以外，还有许多活动地区，范围较广，不受限制。如西北可以到滁来公路两侧（即原嘉山县岱山区。我来江浦工作之前是岱山区区委书记。我来江浦了，岱山区也随之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划归江浦县汴河区管辖），南面可以到浦镇附近，西面可以到乌衣、担子街一带。我们的武装工作队，经常去进行打游击和政治活动。那时消息不灵通，又受津浦铁路和大山的阻隔，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属皖江地区的江浦县委，没有与那个江浦县委取得联系，也没有向江浦大山南部的广大地区开展工作。

我们虽然很靠近敌人，但有利条件是很

多的。从大的方面说，敌占城市和交通线，当时已在解放区的包围之中。具体地讲，我们是背靠巩固的根据地，面向南京、浦镇和津浦铁路两端（滁县至浦口），能进能退，无后顾之忧。

江浦县委、江浦县政府，与别的县委、县政府不尽相同。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一般政治作工和行政工作。我们要组织地下力量，准备在反攻时机到来时，配合我军里应外合，夺取南京、浦镇、浦口和津浦铁路线。为此，就必须向南京、浦镇、浦口津浦铁路南段沿线以及其它敌占区开展工作，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

（二）

我们向敌占区各界、各阶层人士，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文字宣传方面主要是充分利用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和各种书刊，向敌占区人民进行宣传。有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报纸和书刊带到敌占区去，或者邮寄到敌人的内部。但经常的主要的是进行口头宣传。凡是家住在解放区或有亲友在南京、浦镇和敌占区的人，我们就动员他们到那里去邀请亲友到解放区来看看，如可能就与我们见见面。我们根据不同的对象，由有关同志分别出面接待、座谈、交朋友。一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由刘力行和我接待。座谈的内容，从国际到国内。县委的办公室内挂了两张大地图，一张是苏德战争形势图，一张是抗日战争解放区发展形势图。我们充分运用地图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发展的趋势。有些人在敌占区受了敌伪多年的反宣传，对有些问题是非分不清。我们介绍了事实真相后，他们恍然大悟。许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很快接受了真理。他们热爱祖国的心情溢于言表。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为了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诬蔑，发表了一篇长文，题

目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文中列举了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和两军在各个战场上抗击日伪军数量的对比，很有说服力，是我们口头宣传主要依据材料之一。

解放区内生活是很艰苦的，没有招待所和服务员。对来访者没有好的招待，吃饭时最多添上一、二个菜也是炒鸡蛋之类。天黑了，来访者就和我们一起转移到农民家住宿。夏天，青年学生和我们一起到附近河边或水塘里去洗澡，不以为苦，反觉愉快。我们全凭满腔的抗日热情相待，他们却极为钦佩，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他们感到中国有希望了，中国不会亡。

我们有时也通过召开一些会议进行宣传。一九四五年四月间，江浦县委在观音寺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时事座谈会。会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对与会者发了请帖，都是滁河两岸和敌占区的上层人物与知识阶层，共二百多人，座谈了三天。刘力行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没有稿子，自己仅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几条提纲，就从国际到国内讲开了。他详细地讲了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和杀人放火的滔天罪行，介绍了抗日形势，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事抗日，反在大后方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宣传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抗战事迹；号召敌占区各界人士要深明大义，积极配合我军共同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敌伪方面作事的人，也要认清大势，不能再继续认贼作父，貽笑子孙，遗臭万年，而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要做到“人在曹营心在汉”。何去何从？宜慎思之。

这次座谈会，影响很大，与会者感到共产党讲的有道理，共产党的干部，虽然年轻，是有知识的。同时他们又亲眼看见解放区的军队和干部衣着朴素，待人谦虚和气，甚为感动，深表同情。

(三)

我们把从敌占区来与我们见面的人，分为一般和重点两部分。对重点人物，谈的较多，对一般人物谈的较简单些。对他们不能只见过一、二次面，就交代任务或提出要求。要经过多次接触、交谈，彼此都有所了解之后，才能开始提出一点要求。有的人回去以后，还把他们的友好带来与我们见面。来访者遇有不明了的事，他们还能为我们作解释。我们对积极分子，选择其中最优秀者，加以培养，并吸收入党。对敌占区地下党的组织，要求人员精干，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们在南京城内一家私人开的印刷社，找到了几个印刷工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因为那个印刷社有几台圆盘印刷机和少量的铅字，一旦需要时，工人可以为我们印些宣传品，在敌人的心脏内散发出去，这要比从外地把宣传品带进城内方便得多。对印刷工人经过多次接触与了解后，就吸收了其中几个最优秀的入了党，并建了支部。日军投降时，由于干部调动频繁，引起混乱，没有把他们的组织关系交接好，致使他们失去了联系。全国解放后，在审干期间，南京外调同志说：“有人怀疑那几个老工人是叛徒，还骗了共产党很多钱”。我为他们写了证明，说明他们不是叛徒，而是我们工作调动时，没有把他们的组织关系交接好，使他们失去了联系，责任不在他们。当时他们的工资收入非常微薄，又无保障，他们到根据地来回需要路费，在敌占区工作也需要一点活动经费。我们补助他们一点钱，为数有限，他们并未骗取共产党的钱。事实证明，那几个老工人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在浦镇、浦口的工人中开展工作。浦口火车站有个大水塔。它是水源地，我们认为很重要，通过关系把那里开水泵的工人请来。经过交谈，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我们打算，一旦需要时，就通过那里的工人控制浦口一带的水源。

由于时间短，关系少，我们在南京城内，除在印刷社和少数几所中学内交了一些朋友外，在其他方面和大专院校的师生等则接触较少。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对敌占区各界人士是广泛结交，来者不拒，但有所分工，各有侧重，各做各的工作，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即使他们同是一条街上的人，到根据地来，也不能让他们彼此见面。

对敌伪方面人员，或所谓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人，由叶品三、纪立纲两人接待。他二人都是来安县人，原在社会上就有一定影响，利用他们的长处，对这些人进行广泛的争取工作。当时党内也有一些“左”的偏见，顾虑多端，不愿与那些人接触。其实他们最了解敌伪内部的情况，做好了他们的工作，对瓦解与争取敌伪人员最为重要。

敌占区的伪保甲长，因为他们的家庭、财产和全家老小都在敌占区，他们为了保全生命、财产，为敌人作了一些事，不能一律视之为汉奸。经过我们开导，他们有所悔悟，但又不敢公开抗日，只对我们的抗日行动表示同情，或在暗地帮助我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就是个对革命有益的“两面派”。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不高，同意他们当两面派，只教育他们要表面应付敌人，真心对待我们。我们不要求他们为我收捐、收费，只要求他们对我武工队或其他工作人员到敌占区去进行工作时，要加以掩护，要他们向我报告敌情，并作些可能的抗日宣传工作。我们也对他们加以委任，委任他们为我们的保长。他们中多数人也乐意接受我们的委任，认为这是“留有后路”。我们在滁来公路南面委任几个保长，在工作中，他们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四)

抗战时期，在敌后工作，特别是在解放区的边缘地区和敌占区进行抗日活动，是离不开武器的。当时，江浦县工作人员每个人

都有武器，如手枪、驳壳枪、步枪、手榴弹之类。我们爱护武器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因为到边缘地区和敌占区工作，离敌人很近，多则十多里，少则三、五里。随时都有被敌人包围与袭击的可能。我们每个工作人员，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实际上是一支武装工作队。

除了每个工作人员都有武器外，江浦县也有少量武装部队。县有警卫武装，各区有区队，各区人数多少不等，各乡亦有乡小队，但没有固定的建制，武器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真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一九四五年初，江浦县刚成立时，上级将原属嘉山县的岱山区划归江浦县与汉河区合并。岱山区有个三十余人的武工队，他们有的是红军老战士、新四军老侦察员、警卫员、通信员，个个生龙活虎，英勇善战，又会做群众工作。一九四四年秋天，日军在津浦路西扫荡。我军为了牵制敌人，派铁路便衣大队一部来到路东，要求岱山区的武工队配合作战，拔除位于沙河集（滁县北）附近一个伪据点——杨家围子。这个伪据点在一个村庄内，修有碉堡。村庄之外，有一道水围子。水围子以外又有一道铁丝网。一个姓吴的伪区长率领几十个伪军盘踞在里面为非作歹，鱼肉乡民。我们岱山区武工队配合便衣大队对据点进行围攻，并进行政治攻势，在阵前喊话，瓦解伪军军心。围攻了一昼夜，伪军动摇了。第二天，他们把全部枪支捆起来，丢入水围子，化装成老百姓，乘我军休息不备之机，向沙河集逃窜。我们乘胜拆除了碉堡和铁丝网，放干水围子内的水，缴获了三十多支步枪，拔除了据点。附近的老百姓莫不拍手称快。

滁来公路东端八石山上有伪据点。一九四四年冬的一个晚上，岱山区的武工队员，通过里应外合，一举拔除了这个据点，消灭了伪军一个班，缴获步枪七、八支。岱山区

和江浦的汉河区合并后，原岱山区的武装队也合并到汉河区来了。这时，这支武装对津浦路南端的活动有所加强，对滁来公路两侧的活动就放松了。

（五）

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很强的，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每个武工队员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自觉遵守，到敌占区工作，秋毫无犯。吃老百姓的饭，要付现金，对待俘虏不伤害，不搜腰包。

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没有工资，只有饭吃（有时也不能保证），洗换衣服极为缺乏。抗战后期，每人每月才发一、二元边币津贴（边币一元兑换法币三元），晚上行军没有手电筒使用。雨雪天气，没有雨鞋、雨衣和其它雨具。缴获到一些东西要上交处理。受贿、受礼之事从未听说过。患了疾病，药品非常缺乏，后方医院的设备也极为简陋。一些必需药品要从敌占区购买，要经过层层封锁线，真是来之不易。如遇日军扫荡，就把一些药品和伤病员，分散转移到群众家中去，由群众负责掩护。我们对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毫无怨言，反而信心百倍，夜以继日，战斗不已。当时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要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六）

一九四五年五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身亡。法西斯德国垮台，三个法西斯国家只剩下一个久已深陷中国人民抗战泥潭的日本了。同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又宣布对日作战。苏联远东红军出兵我东北，攻占被日寇占领的我东北一些大城市和铁路交通线。日本见大势已去，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淮南路东六合、天长、盱眙、来安等县县城相继解放，整个路东根据地联成一片。只剩下南京、浦镇、滁县和津浦铁路上少数几个地方为日伪军占领了。而国民党拚命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布文告，宣布日本要向他们投降，南京等地要由他们

来受降，致使我军解放南京的计划未能实现，从我们这里进军南京的任务未能最后完成。

我党基于抗战胜利后出现的新形势，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图谋，及时作了新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壮大我们的力量，巩固与扩大老解放区；另一方面从全国各老解放区调集大批力量，进军东北，把东北迅速建成巩

固的根据地。当时，淮南调了大批干部到东北，我也被调到东北去了。留在淮南工作的干部也调动频繁。刘力行调得较早，继任县委书记是杜李。我是一九四五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即中秋节后一日离开江浦的。我走后，工作无人接替，淮南路东江浦县的工作，由于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变化，从此告一段落。

江浦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成员名单

顾问：时作雨、王学知、谢廷模

主任：葛之民

副主任：石振、王杰、叶声、韩华南、程寿轩

委员：张联华、张祥贤、倪雨峰、杨飙、凌竞欧、徐伯鸿、
朱锡友、池正山、金万泉

特邀委员：齐昆、单人耘、吴国亭

文史办公室主任：程寿轩

朱龙镇的由来

——记抗日志士朱龙的事迹

饶伦理 张健行 胡雅芳

高旺这个古老的小集镇在四十多年前，被人们叫做“朱龙镇”，这是怎么回事，还得从朱龙其人说起。

朱龙是我江浦八年抗日战争中战死沙场的民族志士。南京沦陷后，他在高旺率部迎击日寇浴血奋战，直至全队壮烈牺牲，在当时曾震撼全县和附近地区，使我县军民抗日情绪为之大振，对以后江浦地区军民坚持抗战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朱龙（1904——1941）生于甲辰年，属龙，乳名“小龙”，学名“正龙”，考入军校后改名朱龙。原籍甘肃兰州，父从军到东北，后娶当地女生朱龙于沈阳。因有家室，退伍经商，开小杂货铺于北大营侧。“九、一八”变起，日寇攻占北大营，家业被毁，全家流落沈阳。不久父被抓当“劳工”，下落不明，母忧郁以死。

朱龙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历尽艰险，支身逃入关内。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北平招生，报名应试，录取后到南京受训。因志在报国复仇，训练和学习，都极为勤奋。三年毕业，学、术两科，均列前茅，以优异成绩分派在南京卫戍部队下属某教导团当副连长，后升连长。

1937年冬日寇进攻南京，朱奉命驻守水西门。当时南京城防重点放在东南方向紫金山、雨花台一带，西城空虚。12月13日日寇轰陷西城角，强攻入城，朱闻讯率机

枪四挺扼守某桥口，阻击秦淮河对岸来犯之敌。敌受创后，火力愈猛，朱左臂中弹，犹坚守未退，后因流血过多晕厥，被俘。南京城就在这一天沦陷于日寇手中。

日寇凶残，将我被俘军民同胞，成批地用铁丝、绳索串扎成排，驱往城外江东门江滩上用机枪扫射。枪声响起，被难同胞应声倒地，后排倒向前排，复压其上。朱下腹中弹卧血泊中未死，屏息于尸堆之中。这次死于日寇枪杀的我国同胞数十万，即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夜深，朱挣脱绳索，从尸堆中爬出，乘月光逃到江边，抱木浮江而北，顺风力水势洄至西江口附近上岸。乃沿江堤上行，至灵山庙附近王家湾村。因伤痛、疲惫、饥饿，已不能再行动。后经一老妇收养，伤病渐愈。

时值姚镜涵部^①扩军，朱龙为报国仇家恨，旋即应征，为该部所用。因其军事素质好，遂由班长逐步晋升为中队长（相当于连长）。

朱龙在姚部屡立战功。1939年3月朱曾率领一中队武装袭击桥林明因寺伪据点，一举攻克。后在1940年上半年，朱任姚部第三中队长时，驻防青石岗一带。日军入侵该地，朱正面抗击，敌人伤亡甚大。朱部虽也受损，但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0年，姚镜涵的保安大队已扩张

到五个中队，其中张浩洲所带的**第一中队**和孙尚荣所带的**第三中队**，先后驻过高旺，但防地均设于数里之外。在防地不练兵，无纪律，日军进剿，张孙则不战而逃，老百姓又恨又骂。是年12月，孙尚荣部被日军打跑后，即换朱龙的**第四中队**驻防。四中队下设三个分队，计有百余人，武器装备也较好，有步枪百余条，机枪三挺。他们的布防是：一分队（分队长尚殿元）驻东街头观桥子、毛庄一带；二分队（分队长艾华礼）驻西街头邵家山头一带；三分队（分队长郭义成）驻守中队部，中队部设在高旺西街一机米厂内。

1941年元旦前后，江浦城里的鬼子便衣队长冯老三（名同德）之四弟被姚部所杀，冯为报弟仇，要求鬼子清剿姚部。日寇对姚部早就恨之入骨，遂纠集几路人马，企图扑灭江浦境内的抗日烽火。

日寇兵分三路：一支出江浦北门翻山由狮子岭直下中寺，进入阻击圈。朱一声令下，枪声四起，万弹齐发，高呼“打鬼子啊”，声彻云霄。敌仓猝应战，还手不及，死伤十余人，仓皇后退数里。

日军一支出江浦西门沿公路浩浩荡荡而来，抵薛子桥附近，遭到分队长郭义成所部的痛击。另一支出江浦南门走水路由西江口附近登陆，敌两路会合，火力猛增。郭义成坚守阵地，中弹牺牲。朱闻讯率部赶往支援。狮子岭来犯之敌，又复来攻，三面包围，火力益剧，朱部伤亡甚多，组织三次突围未能成功。包围圈越缩越小，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

朱龙独臂高举，身先士卒，率十余人齐向敌人猛扑，又杀敌数十人。此时伪军喊话劝降。朱虑不得脱，拔手枪自击太阳穴壮烈

殉国，时年37岁。因早有舍身取义之志，虽历任军官，未有家室。

这次战役自拂晓开始，至晌午结束，历时五、六小时，虽向大队频频告急，驻桥林的一中队和驻火龙山的二中队，相距均不足10公里，枪声清晰可闻，但他们为保存自己，或按兵不动，或逃之夭夭，坐视不救。朱军孤军奋战，最后弹尽力竭，自朱龙以下官兵七十余人均视死如归，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朱部虽死亡惨重，然在面对日寇大扫荡，敌军兵力十倍于我，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奋起英勇抗击日寇，使敌方付出巨大代价，这对当时日寇以战胜者姿态，长驱直入，骄纵狂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从此敌人不敢再轻视我江浦地区人民的抗日力量。自南京沦陷后，整个战局连遭挫败，在当时抗日情绪一度低落的气氛中，朱部响起了一声惊雷，起了巨大的振奋人心作用。

日寇曾将朱头割下，汉奸冯老三用枪挑起，带至桥林，悬于石碛桥头，见者无不鼻酸泪涌。

朱龙英勇抗击日寇壮烈殉国的事迹，遍传全县，群众同声哀悼。后姚镜涵应群众要求，改高旺镇名为“朱龙镇”，改薛子桥名为“义成桥”。

朱龙及所属一个中队，在抗战中壮烈殉国，在历史上是我江浦人民的光荣，特别是朱龙的英勇精神，尤令人敬仰。朱龙的抗日英勇事迹应载入我县抗日史册。

①姚镜涵名允明。江浦沦陷后，重建县政府，他先后任县政府主任秘书、县长、专员、团长、纵队司令，为抗日时期江浦县头号风云人物。

大难终于临到西江口

胡雅芳

西江口地处长江北岸，东与浦口、西与乌江驻马河相距均约四十华里，隔江与南京大胜关相对，西与桥林有河通航，汛期民船可沿高旺河直抵高旺南郊，是个小水旱码头。这个不起眼的小集市，抗战前居住着百来户人家，其中多数以渔民为主，也有一些农民、商人和码头工人。与江平行有一条东西向的“扁担街”，市上各行各业应有尽有，杂货铺、酒饭馆、茶馆、木匠铺、铁匠铺、客店、理发店、小浴池，甚至连鸦片馆、宝局（集赌的场所）也少不了。街中北侧还有一座规模不大，却倒也象样的庙宇——杨泗庙，终年香火不断。这个古老的小集市，在当时倒也热闹，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繁荣假象的一个缩影。

一九三七年冬，侵华日军步步深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冬月初八，国民党某部数十只大民船和逃难的商船，从下江开往上江。因风大受阻，被迫避入口内。加上当地的商船和渔船计有百余只，排成一条长龙。船上装有大宗的被服、布匹、大米、钢筋、水泥、五洋百货，还有一些枪支弹药。船上人纷纷议论鬼子早晚要来，人心惶惶，气氛异常紧张。

冬月初十（也就是侵华日军首次入侵江浦的同一天）上午十时左右，从上江下来两艘挂着太阳旗的轮船，经过西江口的江面，群众恐是日军兵船，甚为惊慌，如若日军一旦上岸，人民必然遭祸。正犹疑间二艘兵船

果然向口岸驶来。靠岸后，在一面“大日本勇山部队本部”旗帜的指引下，涌出了大群鬼子兵，叽哩哇啦地端着枪冲上了岸，群众四散逃奔。

大难终于临到西江口。鬼子上岸后，兽性大作，见人就刺，见猪就逮，见妇女就抓。一时间，鬼子的狂吠声，妇女、小孩的哭喊声，被杀者的惨叫声，混成了一片。刹时间，惨死在日寇屠刀下的有袁二、卢永富爷孙俩、沈明维之叔、项守元之父、古绪宽之母、冯大、朱老头以及外地客商共三十多人。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这时，一群鬼子发现那么多的船只停在一起，便上船搜查。这群野兽见有国民党的物资，便疯狂地用燃烧弹将百条船只全部炸毁，并抓走了船上的十几名妇女。此时，街口的草房也起了火，风助火势，火仗风威，一霎时，火光四起，烈焰冲天。火光一直延烧到深夜，西江口三百多间房屋成了灰烬，当夜鬼子没走。翌日太阳还没出，一船国民党兵驶近西江口，鬼子发现后，数挺机枪和小炮响开了。船上的国民党兵仓惶应战，一边打，一边就滩下船，谁知滩陷难行，进退维谷，被日军全部打死，无一幸免。打这以后，日寇水上巡逻艇三天两头到西江口来搜查，西江口人民深受日寇铁蹄蹂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至今人们回忆起这段历史，对日寇残暴行径无不深恶痛绝。

全歼十鬼惊寇胆

——新四军在乔家冈一次围歼战

蓝宗植

石村庙地处苏皖交界，是江浦极西一角。抗日期间，新四军常在这一带活动。一九四三年春，这里已建立民主政权“江和全”地区，归江全县香北区石村乡管辖。就在石村庙东南侧半里许的乔家冈，曾发生新四军围歼日伪军的激烈战斗。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清晨，来自乌江的日伪军三十多人，侵入石村庙，大肆抢掠。这天街上逢集，屠户陈三的猪肉也被日伪兵抢去。于是他对来犯之敌留意过目，默记在心。

日伪兵在街上搜遍掠足，约莫九、十点钟光景走出街头，沿着往石桥的大路到了王塘埂，这时，突被射自四马山南的枪声截住，日军立即摇旗掉头奔回石村庙的秦山头，观察还击。

原来这天我新四军江全大队一中队驻在大姚，二中队驻在大谢，和含独立大队（有说叫和西大队）一中队队长关日辉（老百姓叫他关连长）率部驻在龙王山下的竹科乔。他们知道清晨一股日伪军已经侵入石村庙，但人数多少，特别是其中日军多少？尚未摸清。因此，如何围歼还未定夺。这时屠户陈三在猪肉被日伪抢去后，已伺隙逃到东陈，适遇新四军的“关系户”周道正（注），周从陈口得悉来犯之敌总共不过三十几个，鬼子只有十个。周很快就把这一情报送给江全大队的侦察人员和在四马山上的香北区区长杨铭。至此区委和江全大队，针对敌人劳师袭远，孤军深入（这时江浦西南只桥林乌江驻有日军，漫家庙，石桥鬼子已撤走）的劣势，立即作出围歼部署：一中队攻石村庙的秦山；二中队到小乔、大蓝守望；独立一中队（指关连）从龙王山运动到青山把守，阻击敌人归路。与此同时，发动附近黄旗刀会，鸣锣聚众，呐喊助威。

敌忾同仇。中午，一场围歼战开始了。一中队行动迅速，作战勇猛，很快从四马山到下份刘，爬上团山，一阵连续密集的子弹把秦山上的敌人压到山下。敌人纠集起来沿着回乌江的道路向南奔逃。此刻敌人，背面受我一中队追击，正面和左右侧面受我二中队和关连的阻击，伪军吓得只顾逃命，日军虽分头猛扑，却连遭痛打。又见跑到曲家垄子的伪军在关连“交枪不杀”声中，乖乖地成了俘虏，越发感到势孤力单，不得不垂死挣扎，拚命抢占乔家冈西坡高埂窝子田，妄图占据有利地形，负隅顽抗。

鬼子和伪兵龟缩到窝子田时，我军的包围圈愈缩愈小，小蓝碾上，大蓝坟莹头，小乔柿子园等几处高地，都架上机枪，愤怒的子弹直射窝子田，迫使日伪兵不能抬头。我勇猛战士匍匐前进，直逼窝子田，刹时间枪声、号声、锣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经过一段激战，到下午三点光景，眼看窝子田里没有什么动静了，江全大队副大队长吴瑞生同志，一声令下“冲

西葛青年巧计杀敌

李 长 久

我们江浦人民是非常爱国的。抗日战争中，西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用巧计拔除十八迈日军据点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西葛街是江浦县和滁县、来安县毗邻的一个小集镇，也是我县抗日战争时期受日本侵略最早、受害最重的地区之一。这里向西十华里，有个津浦铁路线上的村落，名叫十八迈。一九三八年初日军就在这里筑上了据点。这里向东十华里是东葛火车站，也于三七年底筑上了日军据点。这两个据点里的日伪军，经常窜到西葛街上进行骚扰。十八迈据点里的日军是负责看守乌衣到东葛这段铁路线的，对西葛街的骚扰更加厉害。他们经常到西葛街上以及附近的村子里去奸淫妇女，捉鸡，打猪，任意糟踏，无恶不作。西葛人

民对日寇恨之入骨。其中一些最有觉悟的青年，便思考着如何惩罚这伙侵略者。

一九三九年八月，西葛青年打算将他们的想法变成行动。他们的目标首先是十八迈据点。因为这些青年中有个人叫袁明举，他曾干过一个时候的“维持会长”，对十八迈据点里的日军很熟悉。他想狠狠地惩罚这一据点里的敌人。但是，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觉得事情难于落实，还缺少一个胆子大有经验的人为他们在前头开路，于是他们又想到了闵登科。

这个闵登科也是西葛街上的一个青年，已经二十多岁了。这个小伙子胆大心细，很有勇气。一九三八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下午，他在毛坦桥到草场圩的渡船上，遇到两个日

啊”，侦察班长葛大海等紧跟冲进窝子田，围歼战斗胜利结束。

打扫战场，清点战果，来犯之敌，日军十个全部被歼，伪军二十三个，被击毙三个，逃脱一个，俘虏十九个，缴获歪把子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三八式枪四支，其它枪枝二十多支。被俘虏伪军都经教育释放。唯便衣特务秦汉卿和一个小翻译，因为虎作伥，民愤很大，押候处理。秦汉卿当鬼子便衣特务，密报捕杀我游击队成员，危害我香泉区委书记江全工委组织部长张智锦烈士，实属十恶不赦，几天后，被绑赴石村庙秦山东麓斩首示众。

从此，日伪军再也不敢来石村庙一带侵扰了。人们一度把石村庙说成是“小四川”，可见新四军关日辉等同志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将永远活在石村庙一带人民的心中。

注：周道正江浦石村庙人，原籍肥东，是新四军王苏民同志的表舅，四三年夏在王的劝导下，接受石村乡人民的敦请出任石村庙保长，人们称他是新四军保长。（当时民主政权仍沿用保甲长）

本兵，各背一支短枪，手里提着吃的东西。这时，他产生了夺这两个日本兵身上手枪的念头。当渡船开到河中心的时候，闵登科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两个日本鬼子射击，不料子弹是瞎火，枪没有打响。两个日本兵同时拔出手枪。闵登科身强力壮，眼尖手快，早已跳进河水里，潜水逃向对岸。两个日本兵只向河里开了几下空枪。渡船是与闵登科背道而驰的，等船到河边，闵登科也不知游了多远了。两个日本兵无计可施，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

这闵登科哪来手枪呢？原来他有个哥哥叫闵登仕，在国民党南京特别行动纵队第十四支队当队长。这枪是他从他哥哥那里要来的。八月二十一日这天，袁明举等青年去找闵登科。闵登科一听说去十八迈杀鬼子，高兴极了。于是便一起进行了周密的商讨和安排。下午三点多钟，十六位青年小伙子从西葛出发，步行十华里来到十八迈。快到据点跟前，闵登科和袁明举两人沿着通向十八迈据点的小道，大摇大摆地直奔据点走去。其余十四位青年，从玉米田里隐蔽前进，在据

点的大门两侧埋伏下来。袁明举和闵登科一前一后，越走越接近日军据点了。日军哨兵发现了他们，一看第一个是袁明举，不但没有阻挡，连盘问一声也没有，就让他们两人进门了。这时据点里的日本兵正在吃晚饭，枪都靠在墙上，毫无防范。闵登科从怀里拔出手枪，象点名一样，从日本鬼子的小头目开始，一枪一个，十一个日本鬼子横七竖八地倒下了。有的打死在桌边，有的打死在屋角，有的倒在窗子口，还有一个打死在床底下。门外那个哨兵，听到据点里的枪声，知道不妙，夹着尾巴拔腿就向乌衣方向逃跑，但没跑多远，就被埋伏在外面的青年一枪打中了腿部，倒了下来。

十八迈据点里的十二个日本鬼子，就这样被全部歼灭了。十八迈据点里的枪枝弹药，也全部缴获。闵登科和袁明举两人砍下了三个日本兵的头，为受害的西葛人民报了仇。

从此以后，日本侵略者没有敢再在十八迈设据点。

贺江浦县政协召开文史工作会议

单人耘

钩玄摭史兮江之浦，
励吾民兮爱吾土。
竭诚协力兮期四化，
春光闹兮红杏吐。

云霞蒸蔚兮狮岭舞，
水泱泱兮山媚妩。
万悦千欢兮里之人，
漱芳润兮研览今古！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即席赋贺

抗日战争回忆散记

彭子述

狼子野心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即怀狼子野心，不断侵略中国。远的不谈，自一九三一年有沈阳事变，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其后图谋日亟，终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卢沟桥制造借口，又一次发动侵略战争。接着敌人为了战略上南北呼应，收到夹击的效果，于八月十三日在上海挑衅进攻，意图威胁当时首都——南京，妄想屈我订城下之盟。这样，就揭开了抗日战争序幕。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时间持续八年，动员全国力量，艰苦卓绝，共赴国难，成百万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千万户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日军到处奸淫掠夺，屠杀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中，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人民死亡总数在一千万以上。千人壕、万人坑，华东地区有，东北、华北也有，一片血腥。这皆是日军侵华的罪证。尤其南京大屠杀，仅六周时间，死难者竟达卅余万人。这惨痛的教训，能忘怀吗？中国人永远不能忘！现将我所知道的几件有关大事写出来，作为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纪念。

悲愤话当年

弹指一挥间，时光已流逝半个世纪。今年是抗战五十周年（1937——1987）。在五十年前的十二月十二日，我军退出南京。十三日下午四时左右，日军从各方涌入南京城后，即开始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到处枪声和哭声，日夜不绝。日军杀人放火，奸淫劫掠，无恶不作，被杀者有的砍头，有的活埋，有的剖腹，有的断肢，有的浇汽油燃烧，有的用刺刀戳死。其杀人手段，极尽残忍凶暴，甚至有的妇女被强奸后惨遭杀害。我当时流寓高旺、星甸等地，常遇南京逃来及以后陆续自金大难民区逃出的人，口述日军暴行，听之令人发指。当时仅知死难约几十万人，尚无确数；战后据远东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指挥者谷寿夫的判决书：调查资料证明，据红十字红卍字会掩埋尸体，计有十九万多人，多为被集体枪杀或砍头者，此外零散收埋被屠杀尸体有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四万多人。

当时自南京逃来的李某，原系教导总队桂永清部所属军官。据云：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因城已三面被围，仅北面长江尚无敌踪，仍下令全军撤退。而近二十万人大军，只有往下关方向退走；时挹江门守军尚未接到撤退命令，阻止其他部队出城，曾因此误会，发生冲突，见状多有避入金大等各难民区者。李则绕道绕城到江边，却无一船只可渡。女难民面对滔滔大江，势难飞越，危急时刻，已不顾天寒、水深、流急，跳入江中，因此丧生者很多。李幸得上游漂来木板，遂抓着借以游过长江而得救。后闻纷纷避入难民区的人，被日军多次搜查出来，带去集体枪杀。

江 浦 城 失 陷

江浦在十二月初，就听到隔江隐隐传来炮声，这是日本侵略军狂轰我军阵地。十日前后，炮声渐近南京，轰轰隆隆，有如闷雷炸起，振撼着大地，窗子上的玻璃被震得哐哐乱响，显然日军已以重炮轰击南京城了。连日来，江浦不少人家按“大乱入乡、小乱居城”的古训，扶老携幼，陆续迁到附近镇上以及山里或是乡下。在此紧急情况下，合家计议决定：我于十一日一早，先同家中一部分老弱妇女和行李，先到高旺杜家，等留在家中人收拾后，明日赶来，再定去向。走到大街上，平日熙往攘来的人群不见，茶馆里坐着寥若晨星的几个人。出了西门外，只见求雨山上，正在修筑炮台工事。上午九时到高旺，当日晚餐后，正与杜家兄弟谈论间，忽然听公路上（杜家住在公路旁边）有人传说：“桥林发现来自乌江方面的日本兵。”正惊疑间，天已大黑，公路上突然响起多人零乱跑步声，夹着语言嘈杂声，问之，答云：“日本人已来到桥林。”听罢将信将疑。后来知道，这是江宁县机关、学校及随行警察武装，撤退到桥林，遇到敌人。又隔半晌，才听到公路上大队行军步履声，其间有车轮过公路桥的隆隆声，走了一夜，不闻人语。黎明，始知确是日军。此时江浦方向，传来小炮声，移时，重机枪声大作，开始进攻了。是夜日军自西沿公路奔袭江浦县城，半夜先头部队到达城西门外五里桥，即停止前进，休整布署。天将拂晓，在一片晨雾中，以小钢炮及重机枪火力掩护，攻占求雨山炮台，然后分兵强攻江浦西门和北门。当时城中守军不多，日军以强大火力压制，经激战后，率因众寡不敌，火力悬殊，终于天明后县城失守沦陷。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九时事也。（亦即南京沦陷的前一天，时县长武文，早已事先携款弃城逃走）。据留在城里的家中人说：日军攻城，枪炮之声，震耳欲聋，弹落屋瓦，急如骤雨。当危急时，家人与其他军民人等，相率由东门出城，转到汤泉、星甸。后来知道，攻打江浦的日军，是敌第十八师团长牛岛部。该部在攻占当涂后，即迅速渡江，直袭和县，经乌江、桥林进而占领江浦县城，进攻浦口，完成对南京的全面包围。

凶 酋 处 极 刑

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下午，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谷是日军第六师团长，率部攻入南京中华门，入城后，担任大屠杀的指挥官）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东京引渡到南京，由南京军事法庭进行首次庭审。审讯持续一个多月，至三月十日结束。最后判决那天，我曾应邀到国际南京军事法庭参与旁听，当时座无虚席。有外国人士（当时在南京目睹日军暴行的人）出庭作证；有身受其害者，或亲人被杀者的血泪控诉，闻者动容，多悲愤填膺。谷寿夫人已中年，身材不高，体型粗壮，满脸横肉，短髭如猬，面貌更显凶恶。其时他竟在庭上无耻狡辩，猖獗狂吠，声大气粗，振动庭屋起回声，态度极为骄横，可以想见其当年之残暴野蛮，视人命如草芥，疯狂屠杀中国人民时之凶焰。最后，国际南京军事法庭根据调查资料证明，宣判以谷寿夫违背海牙国际公法，构成战争罪，违反人道罪，违反和平罪，将其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至此，南京大屠杀之主犯元凶谷寿夫，终究天网恢恢，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

前 事 不 忘

在中日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于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并签订和平友好条约，